

高墙之内,有“艾”也有“爱”



2005年监内首个世界艾滋病日活动

本报记者 徐新怡
通讯员 胡慧颖 孙文豪 程飞

就医是权利,改造是义务

早上7点,吃过早餐,罪犯端上杯子,排队依次进入医务室。他们从民警手中接过一个小塑料杯,里面是白蓝黄等各色药片,吞咽后张嘴让民警查验,再进入观察区等待。这其中,有他们必须服用的专用药,而鉴于一些人还同时患有高血压、肝炎等多种病症,一次需要服下几种甚至十几种药,也是很平常的事。

监区政治教导员叶邦慧介绍,服药制度的背后,艾滋病罪犯的治疗已经走了很长的路。2003年,国家就针对艾滋病患者启动免费抗病毒治疗。但很多罪犯却认为“刑期比命长”,拒绝服药。

“我活不到出去的。”民警徐垠飞还记得,这是沈兴(化名)拒绝吃药的第8天,说过的一句话。面对徐垠飞递过去的药,他挤出一丝牵强的笑容,随后望向窗外,眼神空洞。

沈兴曾是一名包工头,因吸毒染上艾滋病。之后工地发生事故,事业被击垮的同时,怀孕的妻子也被查出染上艾滋病。沈兴选择入室盗窃,试图给家人提供所谓的“保障”……入狱后,漫长的刑期和羸弱的病躯让他陷入绝望,拒绝服药成为他对抗命运的“另类”方式。

徐垠飞多次尝试联系沈兴家人,想通过亲情的纽带挽救他。当时,他翻阅档案发现,还有半个月就是沈兴孩子的生日,于是汇报监区,想为对方安排一次特殊的亲情电话。

孩子生日当天,在徐垠飞的劝说下,沈兴第一次拨通了家里电话。“女儿经过检查,是健康的。”电话那头,妻子带来的好消息让他有了“生”的希望。

再次面对徐垠飞递过去的药,他终于没有拒绝。

罪行由法律裁判,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,但艾滋病罪犯也在国家免费治疗的范围里,保证他们的健康,亦是司法公正的体现。“就医是权利,改造是义务。”如今,这已经成为九监区民警的共识。但谁都不能否认,在监区

成立最初,恐惧,才是大家最真实的内心活动。

监区刚成立时,有12名民警主动报名请缨。今年60岁的民警柳青是其中一位。“战胜恐惧的第一步是重新认识艾滋。”柳青回忆。2004年监区筹备之初,便请来疾控专家上课,为民警配备防护装备,开展心理辅导。同年8月,九监区开始正式收押艾滋病罪犯。“提高认识、做好安全防护后,就是建章立制,规范管理,既要防止职业暴露,又要确保教育改造工作有序进行。”在那个谈“艾”色变的年代,艾滋病罪犯构成纷繁复杂,没有成熟的管理模式,民警们都是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

“当初,监区外边的这条路,周边村民都绕着走。”柳青说,他们也能理解外人的感受,毕竟那时候他们自己心里也没底。而如今,通往九监区的马路笔直宽阔,那是一批又一批的民警“开拓”出来的。

从“隔着铁门”到“面对面”

“我梦见一群僵尸向我扑过来,他们腐烂的躯体上,是一张张人脸,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”2011年,李永剑36岁,刚转岗到新岗位的他,连续3天做了类似的噩梦。

那是李永剑进入九监区的第二个月,一天上午,他作为管教民警按例检查犯人缝衣服的针线,在接过犯人递来的手缝针时,他的手指碰到了针尖,瞬间划开了口。“我本能地感觉到糟了,立马跑去冲洗。”在紧急清创后,他第一句话便是,“这事,千万别告诉我老婆。”

在九监区,见血是小事。“不安、无助、恐惧……”在等待检验结果时,李永剑形容“像刀架在脖子上”。好在最终的检验结果是阴性。后来他才知道,刚来九监区的民警,很多都做过噩梦。

职业暴露的风险,是民警的主要恐惧来源。所以,最开始几年,民警与罪犯谈话是隔着一道铁门的,门外的民警身着防护衣、戴着口罩,隔空喊话。一边是口罩下看不清表情的脸,一边是一双双充满敌意的眼睛。铁门隔出了安全,却隔远了人心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九监区决定实施一条早已想到却不敢轻易启动的措施——和罪犯面对面零距离接触。走进罪犯的心里,用真诚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温暖。

第一次“零距离”接触,在双方小心翼翼地试探后,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正式开启。

被判长刑期的唐格(化名)父母双亡,入狱后性格孤僻,几乎不开口说话。为此,民警王在根多次耐心找他谈话。第一次看见民警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和自己面对面交流,唐格向来冷漠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。后来,王在根给他设置了一个沙盘游戏,内容是模拟给父母操办丧事。“让他尽了这个孝道,心中的结才能打开。”

沙盘设置好后,王在根让唐格做个简单的讲解,刚一张口,他就泪如雨下,哭了整整40分钟后,王在根松了一口气:“有效果了。”

后来,唐格和民警袒露心声:他因为没有送父母最后一程,始终没法原谅自己,很感谢有人愿意

走近他,关心他。

“零距离”教育理念下,九监区逐渐建立起了一套“心理疏导、药物治疗、人性管理、公正执法”为一体的患艾滋病罪犯教育改造新模式。“他们刑满总要回去,如果我们的教育达不到效果,他们依旧会影响社会。要让‘感染到我为止’的理念刻在每个人的心中。”叶邦慧说。

不仅挽救罪犯,也拯救家庭

当被问起职业生涯中哪件事情最让李永剑印象深刻,他回答记者的是一个拥抱。

感染艾滋病超过十年,阿杰(化名)得知自己时日不多了。他唯一的心愿是想“落叶归根”,回到老家四川,于是向监区申请了保外就医。

“当我没这个儿子。”民警在联系他家人时,阿杰的父亲拒绝得很干脆。李永剑没放弃,通过社区、司法部门找到他在成都的母亲,辗转联系中,李永剑察觉到这位母亲的刻意回避。“后来我说,我带了你儿子的视频和亲笔信,你看一眼就好,了结他的心愿。”

终于,在一个约定的地点,李永剑见到了这位母亲。“50多岁的年纪,异常苍老,看着像70多岁。”隔着屏幕,这位儿子表达了自己的忏悔:“这么多年,不求原谅,只求落叶归根,能见你们最后一面。”

看到一半,这位母亲突然大哭,“哪有母亲不想孩子的?他被抓的那天,说自己想出去打工,我还专程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,没想到他是去贩毒啊……”哭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“让他回来吧。”母亲最后缓缓地说道。

送她到地铁口的时候,阿杰母亲突然转过来,“警官,我能不能抱一下你?”李永剑刚开始觉得诧异,“你跟我儿子长期在一起,我抱过你,就相当于抱过我儿子了。”

“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感触是,我把他母亲‘救’回来了。”李永剑说,这是他第一次觉得,自己在做的不仅是拯救罪犯,还有挽救这些罪犯身后破碎的家庭。

家人,是艾滋病罪犯生命接力中的重要一棒,但能被家庭接纳的病犯是极少数。在李永剑的观察中,大部分艾滋病犯的家里都不知道他们患病的事实,甚至很多人从入狱起就被亲人断绝了关系。

为了延续这份“接力”,九监区民警不断在寻找一个支点,撑起罪犯们“生”的信念——进行大走访,跨越12个省份为罪犯系上亲情纽带;组建“十一指”乐队,鼓励罪犯唱出对家人的心声;开展心理辅导,用真心融化他们内心的思念……这堵“隐秘”的高墙内,有光照进了。

前段日子,李永剑接到一通从四川打来的电话。“李大,我当爸爸了,孩子很健康!”因寻衅滋事被判10年的艾滋病罪犯,回归社会后不仅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,还顺利结婚生子。

“我太开心了,只要他们能在社会上平安生活,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没白做。”李永剑笑着说。

记者手记:

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艾滋病监区,说实话,心里多少有些忐忑。但当我参观了画室、乐队训练室,欣赏过那些充满活力的画作和悠扬悦耳的演奏后,一开始的不安和紧张,好像减少了几分。面对一名罪犯递上的画,我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,以至于陪同的民警都有些诧异:你不害怕吗?

按说,我应该害怕的,毕竟,“艾滋病”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,不言而喻。可我想想了想,嗯,你们都不怕,我为什么要害怕呢?

采访中,我真切地感受到,在这里,生命是平等的。除了执法者的身份,民警对待这些罪犯,更像是老师和家长。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,是他们勇于、甘于成为这片生命荒原守护者的原动力。在探索艾滋病罪犯的管理与教

育上,浙江无疑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经验,这背后,离不开每一位九监区的坚守者常年默默无闻的付出。

在九监区后面的菜地旁,民警告诉我,花苗种子已经发给了每一位罪犯,等到明年夏天,这片菜地上会开满向日葵。一想到那一片追逐光明的金色即将绽放,我的心里也莫名燃起了某种希望。

“艾滋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”——不害怕,或许正是源于这样的理念。

在这里,虽有“艾”,却有“爱”。



九监区菜地上的向日葵